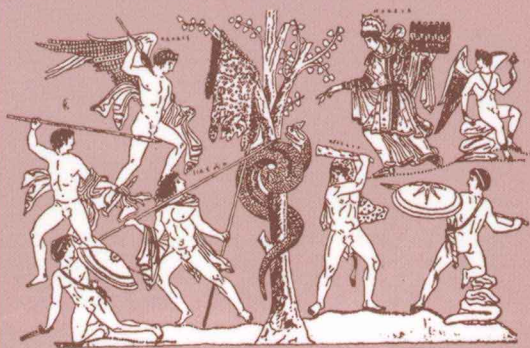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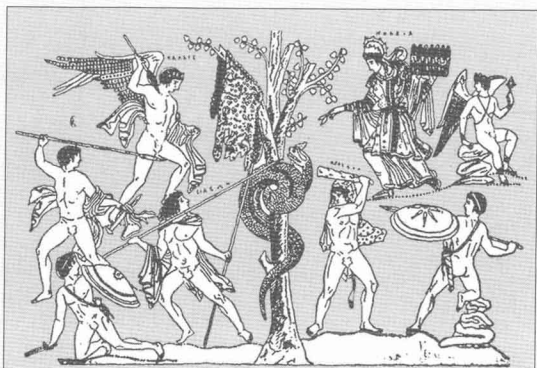
中西因緣

近現代文學視野中的
西方「經典」

張治◎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中西因緣

近現代文學視野中的
西方「經典」

張治◎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张
治著. —2 版.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ISBN 978-7-5520-0087-0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
1815~1949 IV. ①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7693 号

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

作 者:张 治

责任编辑:施恬逸

封面设计:天 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0.25

插 页:2

字 数:266 千字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087-0/I·057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论

一、两种“经典”的汉译

何谓“经典” 中国传统中，古时以作为典范依据和权威指导的重要文本为“经典”。首先是属于儒家思想学术传统的要籍。如《荀子·劝学》有“其数则始乎诵经”的话，杨倞注云：“经，谓《诗》、《书》”；而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又谓“圣哲彝训曰经”。《尚书·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孔传：“典，谓经籍。”唐人刘知几《史通·叙事》中说：“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后来佛教也用是语指称他们的典籍要册，《法华经·序品》说“又睹诸佛，圣主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即是如此。然而追究“经”、“典”二字的早期含义，除了表示“典范”、“权威”之外，都还有“平常”、“寻常”之义。^①这两方面的意思可以互通，即谓典范、权威的地位，导致其始终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解释；而正因为该文本在某个领域中无法绕开，并能够常读常新，遂使之对于其他晚出之文本有示范价值和指导启发的意义。

西方传统文明，以英语表述习惯为例，有两个词具有“经典”一义。一是 **classic** (法语 *classique*、德语 *klassisch*)，意思即“第一流的”、“最好的”，源自拉丁文“*classicus*”，初见于公元2世纪古罗马学者奥略·葛琉斯(Aulus 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一书。书中根据罗马上古先王划分

① 《左传·宣公十二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要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杜预注：“经，常也。”《仪礼·士昏礼》：“致命曰：某敢纳征。对曰：吾子顺先典，贍某重礼，某不敢辞，敢不承命。”郑玄注：“典，常也，法也。”

社会等级(classes)的用法,区分了“一流作家”(scriptor classicus)和“末流作家”(scriptor proletarius)。^①其中“classicus”对应上古社会五阶的第一等级(classici)，“proletarius”则是源自最末等级的“平民”(proletarii,指无财产而仅拥有子女的罗马公民)一词。^②由其词源来看,“classicus”的表述具有贵族气和精英意味,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它所指称的都主要是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写成的古代著作。查考最权威的英语辞书《牛津英语大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直至18世纪,人们才开始以“classic”指称非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其他文学名著。另一具有“经典”之义的词, **canon**, 因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的著作 *The Western Canon* 而变得更为著名,是语源自古希腊文“κάνων”一词,原本指手工劳作中直尺、准绳一类器具,后引申为规则、法则之意,古典晚期用以表示被教会认可的权威《圣经》系统,汉文译作“正典”,用以区别“次经”、“伪经”之属。今日,“canon”一词可表示西方世界所有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或音乐作品。^③

综合中西古今关乎“经典”之义的理解和衍变,此书所界定的“经典”范围包括:

- (1) 存在恒久,经得起时间淘洗,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作品;
- (2) 在具体体裁与文类上富于原创性,长期处于代表性地位的文学作品;
- (3) 为多种语言下的读者所熟悉喜爱,影响范围最大的文学作品。

两种“经典” 但是,当涉及文学的翻译活动之时,尤其是面对陌生的语言文化对象所发生的文学翻译,如何判断或取舍哪些才真正是经典作品呢? 具体而论,我们在本书中关注两种经典文学作品的汉译情

① *Noctes Atticae*, xix 8, 15.

② 参看[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张治译,第2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③ 参看[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第11—2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况：一种是当时中国人所重视的新文类中的代表作。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茶花女》、凡尔纳科幻小说等。在汉语世界的西方文学翻译活动初兴之际，这种对于他者之“经典”的认知与想像，包含了诸多一厢情愿的主观成分和道听途说的讹误。晚清时期，科学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通俗文类流行之时，人们即以凡尔纳、哈葛德、柯南·道尔、小仲马为西洋文学的代表。

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文学经典，则是在更深入了解了西方文学史后追认的经典作品。清末以来，在中国倡导引介西方文学的人士，虽知有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诸文豪，却因翻译能力等诸多原因，在一段时期内“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代之以译介左拉、雨果等近世名家；此后又产生社会进化论的偏见，翻译家往往更多聚焦于与当时文学潮流合拍或与中国现世情况紧密结合的作家作品，亦不肯奢谈“经典”的汉译。比如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集》时，便强调他们关注的是“异域文术新宗”，即所谓“弱小民族”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①郑振铎在1921年也曾提出，“就是确定有价值的东西也似乎不宜乱译”，即以为当下翻译莎士比亚或但丁都有些“不经济”^②；之后他又说，现在选择翻译什么作品，需要“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因此“古典主义的作品”可以缓译^③。当时茅盾也提出，个人的文学翻译活动，要“足救时弊”^④。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始终主张以翻译经典名著为首务的观点。胡适

① 鲁迅：《域外小说集》初版“序言”，《鲁迅全集》，第10册，第1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册，第525页；周作人：《弱小民族文学》，《知堂回想录》，第232—233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

② 西谛：《盲目的翻译家》，《文学旬刊》，第6期，1921年6月。

③ 西谛：《无题》，《文学旬刊》，第46期，1922年8月。但他到1935年以后编订“世界文库”，则又开始注重世界文学名著的汉译，《发刊缘起》说：“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尤将特别地加以重视。”

④ 雁冰：《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文学旬刊》，第45期，1922年8月。

在1918年即主张翻译西洋文学名著,“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①。1930年,他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委员长,组织翻译世界名著及学校教参书籍,其中文学是他最为擅长的领域。胡适借助欧美国家退还的庚子赔款,在三四十年代赞助支持了一大批文学经典名著的汉译,例如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罗念生翻译的古希腊戏剧、李健吾翻译的福楼拜、周作人翻译的希腊拟曲;未能完成或稿件遗失的,还有周作人翻译的《希腊神话》、戴望舒翻译的《堂吉珂德》、伍光建翻译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倡导翻译经典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吴宓,他留学哈佛期间深受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的影响,重视古典主义文学理想。他提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②,其中不仅包含了翻译对象选择的经典意识,亦对翻译者的文学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主编的《学衡》杂志上曾刊发徐震堃翻译《圣伯甫论正宗》一文,介绍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 1804—1869)的“文学正宗论”^③,以“正宗”二字译法文中“经典”(classique)一词,“正宗者,按之常言,则为古之作者,久经崇嗜,而操文柄于域内者也”。“始所谓正宗,无非古人”,然而——

以余之意,则真正之文学正宗,必也能开扩人之心智,而增益其蕴蓄,使之更进一步,或则发道德之真理,阐人情之同感,而莫不在人意中;或抒其思想观察及发明之理,虽文体不拘,要必博大微婉,丽而有则,其文字须出乎一己,而合乎斯世。新而不诡,典而不袭,历百世而犹巍然。

①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不久后即有傅斯年的响应,见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1919年,第1卷第3号。

②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③ 1923年第18期。原作题名“*Qu'est-ce qu'un Classique?*”直译即“何谓经典?”。

其中之意,固然古希腊罗马文学能够流传至今者,必属“正宗”之列,但丁、莎士比亚等超越时代、语言、民族文化之限制而被世人所共赏的作家也身在其中,而近现代的某些作家则仅能得到某个流派或理论主张的信徒所崇敬,便不可称作“正宗”了。这一古典主义的文学思想,后来有梁实秋予以更为明确的阐发,即主张文学应描写“普遍的人性”。他在“人性论”的论争中说:

……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①

他尤其反感带着现实功利态度,为满足一时趋尚或需要的翻译,认为影响极坏:

外国文学影响侵入中国之最显著的象征,无过于外国文学的翻译。……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的态度,其选择亦不是有纪律的,有目的的,而是任性纵情,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模拟。^②

在自己的文学翻译生涯中,梁实秋便充分贯彻了这一思想,尤其以《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可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及至晚年,他谈到翻译的价值评判时仍说:“有学术性者,有永久价值者,为第一优先。”^③他早年翻译中世纪的文学经典《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和古罗马文章大家西

① 梁实秋:《文学批评辨》,《晨报副镌》,1926年,第61期。

②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镌》,1926年,第54期。

③ 梁实秋:《漫谈翻译》,《梁实秋文集》,第5卷,第438页,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

塞罗的《文录》，也都是在这一标准下的实践。

我们在反思 20 世纪上半叶的翻译文学史时，虽然广为稽考，详加胪陈，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文学之汉译往往不成规模，且缺少足够的人力财力的支持和赞助。同日本的西方经典文学翻译比较起来，我们差距很大。比如《堂吉珂德》的日文译述本，早在 1893 年就有《机钝翁冒险谭》；介绍《神曲》大意的《ダンテ神曲物语》出版于 1903 年；坪内逍遥完整翻译第一部莎剧《该撒奇谈》的时间是 1884 年，译完 40 卷的《莎士比亚全集》则是在 1928 年。如今日本译界几乎完成了所有西方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还没有《巨人传》、《疯狂的奥兰陀》等重要作品的全译本，古希腊罗马文学的汉译也才刚刚起步，这实在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二、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视野中的翻译文学

本书作者的专业研究兴趣在于中国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故而在此主要关注的是：自 1815 年至 1949 年间，以汉语言文字翻译并公开发表的外国文学作品，以及针对这些作品所展开的评论、研究等活动，以及由此发生的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①魏晋隋唐时代兴盛的佛经翻译中有文学的内容，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也曾将一部分古典文学的故事和诗歌译成中文。以 1815 年作为起点，是根据本书论题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一般近代史，以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为起点。在此之所以强调 1815 年，是因为此时传播西学的近代报刊已然出现，欧美的新教传

① 《周礼·秋官司寇》：“通夷狄之言曰象胥。”《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教士在南洋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等中文杂志,1833年,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意义的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办,这些刊物催生了一系列传播介绍西方人文学术的著作,其中也包括对西方文学的介绍。这130余年中,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长久以来稳固停滞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产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被称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康有为),包括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以及文学的语体变化、文学的思想观念变化。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比如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历史学术著作的翻译等等,与文学的翻译往往也有种种关系,比如声光光电的一些名词,社会风俗的介绍等等,也会影响文学活动。

翻译文学,尤其在现代文学史的时期(或者扩大为20世纪上半叶时期)与文学创作也具有紧密的关系。外在环境的变化从根本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言说方式,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文学翻译,作为西方文明进入中国过程中一项深入到言语层次的活动,反映着主动的选择和被动的接受两个方面,对于汉语文学后来的发展变化,自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百余年的中途,新文化运动提出要废除文言,提倡白话的文学,这是语体上的变化;文学观念上,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作家们逐渐重视创作中的社会批判意义和个人的抒情特色,而不再是以弘扬儒家正统道德学说为要务。这些重要显著的变化,与翻译文学的直接影响关系甚大。如果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意识来审视翻译文学史,便会发现现代文学家的创作活动与翻译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其一,现代文学作家大多兼有翻译家的身份,从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郑振铎、李健吾,到洪深、巴金、冰心、徐志摩,再到朱光潜、梁宗岱、朱湘,都是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译介外国作品和理论;其二,翻译使新文体得以确立,比如胡适的白话诗是从他翻译美国女诗人 Sara Teasdale 的《关不住了》开始的,周氏兄弟早年翻译的域外小说对鲁迅后来的短

篇小说写作提供了文体上的训练,再如郭沫若翻译歌德、雪莱的诗,也为他自己的抒情诗写作提供了灵感^①;其三,翻译文学启发了新一辈作家,正如林译小说影响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第一代作家那样,20世纪越来越丰富的文学翻译作品为后起之秀们树立了母语写作的榜样,这使得外国文学的养分渐渐渗入汉语的土壤之中。

此外,论者还以为,翻译文学应该纳入现代文学史,成为一个专门领域或类别。^②如今已经是电脑时代,以电子辞典或在线翻译为工具,随意将一篇外文小说或诗歌转化为汉字,绝对不能与文学家们的创作相提并论(除非原本就是谁也看不懂的荒诞派诗歌)。但是正如并非所有的写作都可称之为文学创作一样,纯技术性的翻译活动,也应该有别于包含了译者本人对于中外不同语言文学的独到领会的那种带有创造性价值的活动。^③茅盾在新文学初期曾提出,文学翻译家要具备“创作天才”。^④虽则这个说法遭到了他人的非议,但仔细想来还是很有道理的。^⑤况且现代文学史上,我们也曾见过某些名家名作,其实是东拼西凑地“偷师”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和成句。这种不尽诚恳和忠实的“类翻译”,却能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重点,相比之下,对于一部完整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里,所折射和反映的译者本人的文思与才华,我们是否过于忽视了呢?当然,话还得说回来,我们所衡量的翻译文学之价值,决不可能单纯以其中译者的“创作”风格为标准的,因为翻译依然是要尽可能完整全面地传达原作的风味。这可能是我们讨论翻译文学的文学价值时,需要始终记得的一点。

① 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引》,《创造季刊》,1923年,第1卷第4期。“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

② 参看谢天振:《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上海文化》,1989年第6期。

③ 题外话是,今日学术体制下,有些学者不愿意下工夫去做学术译介的工作,就出现了将外文学术文献的材料翻译过来直接占为己有的个别现象。

④ 《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小说月报》,第2卷第4号,1921年4月。

⑤ 郑振铎:《翻译与创作天才》,《文学旬刊》,第2期,1921年5月。

本书对于翻译文学的考察研究,并非对外国文学史局部内容的重复。文学作品跨语言文化的国际旅行,往往造成该作品在不同国别之文学史中地位的不同。有些中文系出身的学者所开设的外国文学史课程或相关之研究,已经出现这种混淆了。就是说,他们在没有受过系统的外国语言文学的训练或读过足够的外语学术研究著作的情形下,在判断或评价某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他依据的经验是中国式的,所以就会将某些作品当成是巅峰之作或以为其影响极大,但放回原本的语言环境中并非如此。这就好像有的外国汉学家笔下的中国文学史,会把《好逑传》、《剪灯新话》之类较早流传海外的作品当成最好的作品一样。回过头来,这种中国视野里的外国文学史,其实是汉语语境里面的翻译文学作品和阅读经验所构成的外国文学史,这绝非没有意义的,比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在一段时期会在中国这么流行,这是有研究意义的。但是如果非要把他们当成是爱尔兰文学或苏俄文学的最高峰,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本书对于翻译文学的考察研究,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自20世纪末以来,现在的比较文学界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转向,就是从以前的平行研究,转向关注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这个转向,背后还有一个文化研究的背景。^①也就是我们再去关注翻译活动时,主要不是关心它的语言问题或单纯的文学问题,比如翻译得准确与否,存在着什么样的误译,诗歌翻译得是否传神等,而是关心一个文化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翻译,以及其翻译的结果,关心译作的传播、接受、阅读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因此,这个带有比较文学新方向、文化研究色彩的翻译研究,也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

① 谢天振:《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三、“回到历史的现场”

近现代翻译文学是近年比较热门的研究论题,此前涉足这个领域的,多是外国文学研究者,目的是为了梳理某一作家与中国的关系。今日讨论这个题目的学者,则多出身近现代文学专业,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也使得原本专业领域的擅场被带入到这个新论题下,即通过对于原始材料的钩沉辑考,将尘封于故纸堆中有价值的信息一点一点地发掘出来,使之重见天日。这个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证据的恒湊胪陈,更重要的是,使由于时代的原因被历史所遗忘的那些富于创造力和文学才华的翻译经验,经过研究者的梳理和拣择,再度呈现于今人面前。

目前关于翻译史或翻译文学史的专著已有不少。^①名之为史,很多实则是材料汇编,大体可知各时期有哪些翻译作品。但材料搜罗得比较粗疏,不少可能只是摘录图书馆目录或各种工具书,也有可能就是道听途说。1951年,周作人写过《关于编写中国翻译史的意见》一文,提出“第一步搜集材料最为紧要”^②。此书撰写过程中,首先检索主要的期刊篇目和出版物目录,这主要包括: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3卷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984年;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集6册),北京:三联书店,1958—1959年;

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2册),天津:天津人

① 比较重要的有:马祖毅:《中国翻译史》,5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6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② 《翻译通报》,1951年,第2卷第3期。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册,第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民出版社,1988年;

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7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吴俊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分册,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分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上海图书馆编印:《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附索引2册),1979年;

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陈鸣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897—1929,1930—196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

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

根据以上工具书提供的线索查阅原刊及原书,并在此范围之外,尽可能地彻底充分利用各种文献数据库和各大图书馆提供的网络目录检索系统,以亲见原始材料之面貌为底线,不盲信任何转述和回忆性文字。为了向阅读者凸显这一历史现场感,本书选用了许多由原始文本扫描的图片。

简单说,希望能够在此带领读者回到翻译文本所形成的历史空间中去,通过具体生动的翻译文学个案来体会本书所设置的题目,力图尽量避免宏大而空洞的文学史叙事。在研究方法上,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指导和玄奥的分析手段;但在具体面对这些个案时,我们或许可以自行总结出一些自己适用的研究方法来。

目 录

序论	1
一、两种“经典”的汉译	1
二、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视野中的翻译文学	6
三、“回到历史的现场”	10
第一部分	1
第一章:乌托邦文学与科学小说的翻译	3
一、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的汉译	3
二、乌托邦文学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	11
三、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引入	16
第二章:《巴黎茶花女遗事》与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	23
一、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经过	23
二、《茶花女》与传统言情小说的比较	30
三、《茶花女》之后中国言情小说的变化	35
第三章:福尔摩斯的东方传人:侦探小说在中国	43
一、清末民初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翻译及影响	43
二、其他侦探小说的翻译	50
三、这一时期侦探小说创作的概况	55
第四章:儿童的发现:西方童话在中国	62
一、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	62
二、对安徒生的介绍和翻译	75

第二部分	83
第一章:探索西方文学之源: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译介与传播	85
一、晚明以来对于西学古典的点滴认知	85
二、《伊索寓言》的汉译史	96
三、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的输入	106
四、古希腊戏剧的汉译	118
第二章:初识西方中古文学:浪漫传奇与市民故事	133
一、林纾翻译的中古故事集	135
二、五四以后对西方中古文学的介绍与翻译	140
三、文艺复兴之前驱作家的汉译	148
第三章:中文世界里的但丁及《神曲》	158
一、但丁《神曲》在中文世界里的译介	159
二、作为“文艺复兴”之代表的但丁	172
第四章:戏剧中的人文思想: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与改造	178
一、晚清民初对莎士比亚的介绍和戏剧本事的翻译	178
二、五四以后对莎士比亚剧本的译介	184
三、搬演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经验	192
第五章:人文主义骑士堂吉珂德东游记	196
一、堂吉珂德来到中国	199
二、堂吉珂德与哈姆雷特	206
第六章:歌德的汉译与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213
一、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溯源	213
二、对歌德及其著作的认识和翻译	215
三、歌德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227
第七章:狄更斯的汉译与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	233

一、“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接受	233
二、狄更斯作品的介绍与汉译	238
三、现代中国作家对于狄更斯的学习	248
第三部分	253
第一章：文言译诗	255
一、诗可以译？	255
二、最早的汉译欧西诗歌	257
三、清末民初的文言译诗	265
四、五四以后偶尔出现的文言译诗	268
第二章：以译为学	274
一、晚清以翻译为新学的风气	274
二、严复译《天演论》	278
三、民国时期的几种学术翻译	286
附论：古典与风土之间：日本传统文学的汉译	291
一、20 世纪初期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	291
二、周作人在民国时期译介的日本古典文学和俗文学	294
后记	307